

产权转让过程中暗箱操作,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有些人通过一次资产交易就成为亿万富翁;一些产权交易机构自立规则,控制和操纵中介的运作,获取暴利……针对这些问题——

老总代表呼吁产权交易立法

企业管理层更要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通讯员 李光伟 本报记者 李凤发

“终于被确定为议案了。”1月29日上午,湖南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主席团会议决定,把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国华领衔提出的《关于制定〈湖南省产权交易监督管理条例〉的议案》确定为此次大会的第9号议案,交由湖南省人大财经委办理。听到这个消息,陈国华代表难掩兴奋之情,脸上露出一种成就的微笑。

3月8日,记者看到了陈国华起草的长达10页、5000余字的《湖南省产权交易监督管理条例》(草案)。“这个条例肯定还不太成熟,仅供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参考。”

十年经历,触摸产权交易市场弊端

陈国华,湖南祁东人,1999年开始从事产权交易工作,现任湖南华诚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其公司先后成功拍卖了130起。最为闪光的业绩是,2003年把祁东铁矿第一段拍卖了3.46亿元,2004年把该铁矿第二段拍卖了405亿元,2005年把衡山纳长石矿拍卖了309亿元。

行走在产权交易这个新生行业,领略风光,也触摸到了其中许多盲点。长期在外工作的陈国华,声音里依然有淡淡的家乡腔:“湖南产权交易市场近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全省缺乏统一、规范的产权交易管理法规。“产权市场的法规多数是各地根据自身需要,制订的地方性规章或行政性规章,缺乏统一性、规范性,让某些机构

乃至个人钻空子,谋求私利。”

二是产权交易监管部门与产权交易机构权责不明确。湖南产权交易机构众多,但又各自为政,没有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产权交易平台。产权交易信息公开不充分,透明度不够,产权转让过程中出现暗箱操作现象。主要表现为,产权管理体制结构不清晰,产权监管部门与交易机构权责不明,监管力度不强,监管措施不到位。让某些机构有可乘之机,打擦边球,以表面上的合法合规来达到其暗箱操作、谋求私利的目的。某些大中型国企资产处置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公开交易,有的国有资产及集体资产处置工作早就已经内定买家,资产评估时就操纵资产价值,并早就确定特定的交易场所,选定信息发布时间、发布媒体及版面,并根据已定买家的情况设定特定的条件,提高意向竞买人的准入门槛,最终将资产交易给指定买家,来达到其吞食国有资产、谋求私利的目的,有些人通过一次资产交易就成为亿万富翁。“这类所谓的公开交易在程序上看似合法合规,实际上有的资产操纵价格低于资产本值的60%”。前不久,湖南省纪委查处湘潭某市级领导一案中,其在一企业资产处置工作中利用职权将价值5000万的资产以700万元违规交易。

三是产权交易市场参与各方责权利不清。产权交易机构将本属于法律法规已明确界定的交易活动或者应由中介机构经营的业务包揽在自己名下,自立规则,控制和操纵中介的运作,强迫中介机构接受其制定的霸王条款,获取暴利。现在有些产权交易机构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

员,对外行使国家公权给予的优势,垄断大部分的待处置国有、集体资产处置权,对内则实行比民营企业标准还高的奖励办法,工作人员在促成一单交易后甚至可获得几十万元的业务奖励。而那些依法依规设立的产权交易中介机构即便已经跨进了国有资产处置资格这道门槛,但却难有机会去公平操作国有资产阳光处置工作。即便有些资产需要中介机构进行处置,也是产交所按委托方指定的中介机构实行产权交易,无任何公开渠道。

酝酿半年,自发起草法规草案

当上湖南省人大代表后,陈国华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心中涌动:推动省人大常委会在产权交易上立法。从2009年8月他就开始了议案调研。先后到上海、北京的同行那进行调查,听取他们的意见。多次找长沙产权交易专家商讨。一番艰辛的准备和“充电”后,去年10月,他起草出《湖南省产权交易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后,又找长沙同行征求意见。“前后修改了几十次。”去年11月份,陈国华拿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到湖南省人大财经委征求意见。经过再次修改完善后,今年1月24日,在湖南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陈国华领衔几十名省人大代表共同提出了《关于制定〈湖南省产权交易监督管理条例〉的议案》。

三大方面,详陈法规重点内容

陈国华认为,在制定产权交易监督管

理条例时应重点规范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确立产权交易的管理体制,明确产权交易监管部门的职能职责。产权交易管理体制在全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的已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如上海模式,其特征是决策层、监管层、产权交易平台分离,决策层与执行层分开,做到“裁判员”与“运动员”分离。“这种体制值得借鉴。”

二是要统一、规范产权交易场所,形成区域性产权交易大市场。目前,湖南省已建立起了房产、国土、技术和综合性的产权市场,它们都是依法设立的某类产权合法交易的场所,在各自业务范围内发挥着作用。“要按照统一、规范的要求,整合资源,形成区域性的产权交易中心(大市场)。我认为,可在一个统一产权交易平台的基础上,把专业性或自成体系的市场作为其一个部分或专业分支,遵循统一的产权交易大规则,从属于一个统一的产权交易监管机构,由其对具体交易过程进行监管,履行裁判员的职责。”

三是建立产权市场的会员制交易方式。产交所不直接参与产权交易,只为会员单位即交易机构提供交易场所,提供信息、咨询、协调等各种服务。“产权交易应在产权交易监管部门的监管下,按照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选择产权交易机构的会员,采用公开竞价的拍卖方式在产权交易平台上进行阳光操作,消除由政府或政府决策部门、领导者、产权交易监管部门以及产权占有使用单位和指定中介机构选定买主,确定成交价格等行政行为,杜绝走过场、协议交易等情况出现,防止国有、集体资产流失。”

公募基金老总集体呼吁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探索走进“两会”提案

一边被公认为是高收入行业而颇受质疑,一边是高压、严监管下人才流失日益加剧,基金行业股权激励在越来越激化的矛盾中两难。“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谢卫的一纸提案再度将基金公司的股权激励话题推到舆论的中心。

业内疾呼的不只谢卫一人。2009年底以来,华夏、博时、易方达等大型基金公司的高管步调一致地谈起了股权激励。

合力呼吁

2010年2月,华夏基金老牌明星基金经理孙建冬宣布离职并将进入私募领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998年即加入基金业的博时基金副总经理李全转入保险行业的消息再度传出。

正是看着越来越多老同行的“出走”,作为基金行业唯一的政协委员,谢卫首份在两会上递交了一份有关基金行业的提案——《关于探索基金公司股权激励机制的提案》。

谢卫认为,基金业快速发展至今,最关键的人才问题没有有效解决。

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共计有38家公募基金公司发生了98起高管变动,共有150只老基金变动基金经理。多数基金的现任基金经理管理基金的时间越来越短。

其实在谢卫之前,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近期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到股权激励问题:“如果没有制约机制,股东一变,管理团队就变,基金经理缺乏长期职业规划,基金公司也很难实现长远的发展。应该形成一个制度,让优秀的人才愿意长久做下去,把基金业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

范勇宏的观点引起了很多同行的注意,被认为是基金行业“老大哥”的华夏基金面对人才流失也有些显得坐不住了。基金行业中,无论大小公司,都在为这个共同的话题所苦恼。

“大锅饭没有前途,公募基金比不过



私募。”“由公转私”的上海从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掌舵人吕俊则在叫板他的老东家们。他称,目前公司的投研人员全部来自基金公司和券商,员工知道自己何时、何种情况下能够分享公司利润,其劲头是在公募基金无法比拟的。

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曾笑称:“说实话,到了12月,基金公司老总就要犯愁‘把奖金发完了,谁又该走了’的问题。”现在肖风的观点依然没有改变,他认为,股权激励一直是行业的呼声,《基金法》目前正在修订过程中,如果把私募基金写进去了,自然会把自然人持股、员工持股放进去。

易方达基金一位高管也表示,谈“激励”并不是简单地为了利益,基金公司依靠的是人力资本,更需要让人培养有效化,基金公司需要人力资源配置的权利。

老话新说

其实,2005年底,监管层和基金公司就曾探讨过基金公司股权激励的办法。2007年业内一度认为能推行试点。

最早考虑做股权激励的是博时基金,南方基金还曾将目标定为“2008年将升华管理积极促成股权激励落实”,嘉实和易方达当时都被认为是可能的试点。

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股权激励石沉大海,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高收入在

国内外都受到争议,而国内基金业被公认为高收入行业,尤其是在市场下跌阶段,投资者遭受损失时对其股权激励更为抵触。2008年7月,财政部专门下文叫停国有控股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激励。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研究总监王群航则认为,不一定要拿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股权优劣作对比,基金经理出走,一方面是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的需求,一方面也碍于公募制度设计中对于基金经理自身买卖股票的禁令,无法投资于自己所擅长的领域。

也有基金公司高管认为,部分放从业人员投资股票的限制也是稳定人心的方法之一。一些基金公司也在试图通过改善考核体系和培养计划来留住人才。

但基金公司高管们的大声疾呼能否有效则需看监管层的表态。

“基金公司股权激励短期内是否可行并不重要,现在还是在一个凝聚共识的阶段,达成共识比什么都重要。”谢卫称。

股权激励探索走进两会提案

“基金公司允许外资持股,允许民营企业持股,但单独不允许管理层持股,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基金法》、《证券法》立法小组组长王连洲表示,基金业最大的资本是人力资源,管理层适当持股合乎情理。实际上,早在2006年6月,证监会基

金部就召集13家基金公司的负责人开会,初步探讨基金公司股权激励办法,并最终确定基金公司管理层持股上限不得超过20%。

进入2010年,基金业再度陷入明星级人物离职的狂潮。

继年初泰达荷银的王勇、华夏基金的孙建东和张龙之后,东方基金明星基金经理付勇、南方基金“老”基金经理冯皓和谢伟鸿,以及南方基金投资部总监苏彦祝也先后辞职。春节前后10天里,有21只基金换帅。而博时基金副总裁李全也传出消息将出任新华资产管理公司总裁。

这些明星人物都是中国基金业能够大发展的绝对中坚力量,但都在陆续离开公募基金而去。在全国两会期间,国内基金业唯一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谢卫递交了《关于探索基金公司股权激励机制的提案》,建言从改变当前基金业的股权结构入手,为公募留住这些精英人才。

“行业十年的发展也培育累积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如何留住并进一步壮大这一专业团队可能是基金业下一个10年发展的动力。”谢卫委员对于当前基金业的人力状况表示出深深担忧。

股权激励可“新老并重”

谢卫建议,基金公司开展股权激励建议新老并重。一方面可以考虑允许具备条件的基金从业人员等专业人士参与新基金公司的发起和设立,另一方面,对于已经成立的老基金公司,可以通过股权激励鼓励员工持股。另外,可以建议选择从合资基金公司,尤其是外方股东有股权激励及成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经验的合资基金公司开始试点,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成熟成功的经验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基金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另一方面也比较容易获得大股东的支持。从试点地区来看,浦东新区可以率先进行尝试。(本报综合)

三大航掌门人 警示高铁危机

提议改革航空业

在异军突起的高铁面前,三大航空公司一改往日竞争关系开始一致对外。近期,三大航掌门人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来自高铁冲击的担忧。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东航董事长刘绍勇借全国“两会”的机会提出建议,希望国家能关注高铁与航空业争夺市场的状况,并出台相关政策扶植民航业发展。

刘绍勇表示,由于空域资源不足、支线航空不发达、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原因导致我国民航业国际竞争力薄弱,已严重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2012年即将建设完成的“四纵四横”高铁客运专线几乎覆盖了我

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国内60%以上的民航市场都会受到冲击,对我国航空公司的发展将产生直接和持久的压力。

此前,国航董事长孔栋也指出,高铁的网络规划,必将改变中国综合运输体系的现有格局,民航业也必然受到“很有生命力”的高铁的巨大挑战。而南航董事长靳民更是早在去年年底就提出“与宏观经济形势变幻莫测相比,我国高速铁路的迅猛发展给航空业带来的影响要确切、显著和长久得多,高速铁路的崛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针对高铁以及民航业目前遇到的其他难题,刘绍勇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民航业的意见》,在国家层面确立民航战略地位和战略规划;同时从空域体制、资本结构、产业布局和服务流程方面加快民航改革。他具体提出,希望国家加大空域资源开发,加快京广、京沪和沪广“平行航路”建设,建立自由飞行区域,减少飞行禁区。在刘绍勇看来,只有国家加

大政策扶植力度,航空运输业才能不断提高竞争力,来抵抗包括来自高铁等其他运输方式的竞争。

在国航、南航、东航这三大行业龙头企业都感受到了来自高铁的“威胁”时,其他航空公司就更加没有还手之地了。自去年年底武广高铁开通运营以来,部分以前运营该线路的航空公司纷纷退出,剩下的少数航空公司也只能以低价来“拼死一搏”,于是机票卖出白菜价的消息不绝于耳。而据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0年,营业里程将超过12万公里,其中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里程将超过18万公里。而中国目前正在试验的时速500公里的高速机车,已经和部分支线航班的班机速度接近。所以,不少业内人士都预测,空铁大战现在还没有正式开打,如果规划不合理,双方未来的激战将更加惨烈。

不过,对于高铁的影响,民航局局长李家祥显得相对乐观。他表示,我国高铁发展对民航业在一定距离和路段上有影响,主要是业务上的影响,同时要看到这种影响对民航业带来的积极变化。李家祥说:“首先民航业要调整航线结构,将原来短途航线变成长途航线。下一步我国民航业将多开国际航线,加强国际业务,会对促进我国航空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带来积极变化。”

其次,在国内支线业务上,尤其是比较边远、高铁不能通达的地区,民航的通达性更强。去年虽然高铁发展很快,但是民航在国内支线业务方面业绩很好。同时,民航业可以通过整合向大集团发展,提升竞争能力。(肖玮)

中电投总经理 建议大力发展核电和水电

□钟晶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陆启洲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要完成政府提出的2020年一次能源比例达到15%的目标,任务艰巨而紧迫,当下完成上述目标必须大力发展核电和水电。此外他透露,受到旗下火力发电上市公司亏损影响,公司整体上市计划已放缓,并表示感觉对不起股民。

“低碳经济成本很高”

“我国做过一个测算,预计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45亿吨标准煤,那么,非化石能源的比重就要达到6.75亿吨标准煤,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3倍。发展低碳经济任务十分紧迫。”陆启洲表示去年我国消耗了31亿吨煤,这种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下去,作为发电企业必须调整电源结构。去年中电投的火电投资首次低于50%,今年也将仅为38%。

他认为,低碳经济绝对不是低成本经济,而是成本很高。当下风电完全成本大约要0.8元一度电,太阳能约为每度1.5元,消费者难

以承受。而水电和核电属于低碳能源里面成本比较低的,上网电价均可以做到低于火电价格,当前应该大力发展核电和水电。

“两三年内资本难运作”

由于火电看不到盈利前景,目前发电企业如华能集团计划将新能源分拆上市。作为五大发电集团之一,中电投内地拥有5家上市公司和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电力。

对此,陆启洲表示,目前中电投还没有这样的计划。“2008年我们以火电为主上市公司亏损,导致我们在这两三年内难以进行资本运作。原来计划现在区域公司整合最后整体上市的计划也因此而暂缓。作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我们觉得很对不起股民,股民买了我们股票不仅不能分红还要承受亏损。”陆启洲表示。

最近,对一些小基金的高管而言,可谓度日如年。除了业绩方面的压力外,还可能面临股东甚至是监管部门的“逼宫”。春节过后,一直又是基金公司人士变动的高潮期,提前给自己安排一个“下家”,也成为不少高管暗自盘算的大事。